导　　论

现代化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着眼点是研究不同类型的国家如何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并由此而形成了对现代化的概念和发展模式的各种不同理解。

美国学者丹尼尔·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失》一书中提出,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是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从 17 世纪以后向欧洲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18 世纪至 20 世纪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这是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论的现代化理论。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西里尔·布莱克在《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一份比较报告》一书中批判了那种认为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应当视为全世界仿效的榜样，只有照搬西方的全部制度和观念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观点。他指出,现代化是‘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涉及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各个方面。

贝迪阿·纳恩·瓦尔马在《现代化问题探索》一书中,从纵横两个方面对现代化的历程和现代化的内容进行了综合考察。他认为,从广义上说,现代化可以包括历史上所有的重大变革;从狭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说，现代化则起自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18 世纪后半期随着英国的工业化而得势，并于 19 世纪席卷西欧和北美，以后又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它是指“一种特殊的社会变革”，而且是一种有针对性的变革过程。它的目标是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国家自主和社会改造。书中把现代化观念分为浪漫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四种，把现代化的模式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但不论是哪种模式的现代化，它所引起的社会变革都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现代化问题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现代化研究的著名学者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一书中对现代化做了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①

还有许多学者分别从科学技术、社会结构、社会发展、思想文化等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现代化的作用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强调。

中共中央党校郭德宏教授在对国内外有关现代化概念的各种不同表述进行了比较分析之后，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现代化既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第二，现代化是一场深刻

的、全面的社会变革，不仅仅是指经济和科学技术，还包括政治、组织、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 第三，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是基础，工业化是核心，科学技术是先导和关键，人的现代化是主题，要在各个方面加以努力。[②]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现代化标准研究》课题组在对国内外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比较之后，对现代化的基本涵义作了这样的界定 现代化是指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推动下，由工业化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过程。这一过程，在世界范围内表现出这样一些特征 第一，现代化是一场革命，这场变革的规模和深度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第二，现代化的变革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和各个方面。至少包括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以及社会成员流动和分化、文化教育的普及、传播媒介的扩展、政治参与的扩大等等。第三，现代化具有世界性。现代化发源于欧洲，但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世界性的现象。现代化导致不同发展程度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同时，现代化在不同国家的实现道路又有所不同。第四，现代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有其基本的内涵。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受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影响，世界现代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内容也日益丰富。第五，现代化运动呈加速发展的趋势。现代化起步晚的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加速发展。[③]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完全可以为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提供科学指导。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随着作为生产关

系总和的经济基础的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观念等等必然要随之发生变化。所谓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一次巨大的社会变动,是在工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和在工业生产力发展的促动下，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即工业文明逐步确立的过程。它包括全面的、整体的社会变动和发展。

中国史学界关于现代化的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给理论界提出了现代化的研究课题，现代化研究的深入开展也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始于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章开沅教授主持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和罗荣渠教授主持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这两个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的立项及其研究成果,对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开创性意义。随后,各种现代化研究,特别是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但总的来说,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在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方面,宏观研究的多,微观研究的少;对整体研究的多,对区域研究的少。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是一个发展中的落后国家。不仅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曲折复杂，而且地区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通过对不同区域的现代化进行微观、个案研究,对于深入探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全面认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面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区域现代化特点和规律的探讨，对于特定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更为直接的启示作用。

我们在山东区域史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了山东区域现代化研究这一课题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关于山东区域现代化研究，台湾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著《中国区域现代化研究：山东省（1860—

1916)》称得上这一方面的开创性综合研究成果,资料极其丰富,并用西方现代化理论进行评述,给人以诸多启发。而到目前为止,大陆学术界尚没有有关山东现代化方面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出现，已有的有关研究成果大多是针对个别问题的个案研究，关注的重点也大多集中在改革开放之后，从历史的角度对山东区域现代化的过程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尚无人开展,我们这项研究就企望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山东地处东部沿海,无论在古代、近代,还是当代,山东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山东区域现代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典型的意义。我们这个课题把山东区域现代化的时间扩展为整个山东近代时期,即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起至 1949 年山东全境解放止。在这个时空内,依照山东区域现代化的酝酿、启动、进一步启动、更进一步启动、全面启动以及实现现代化新旧模式的转型这个现代化演进历程,进行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以求对近代山东区域现代化的发展脉络有更清晰、更系统的把握和认识。根据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并结合山东区域的实际情况,对山东区域现代化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递进轨迹及各个层面的具体情况,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以求对山东区域现代化的面貌有更全面的了解。进而以上述两方面的研究为根据和基础，总结出山东区域现代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不同于全国其他区域现代化的特点和历史教益。本课题突出研究山东区域现代化新旧模式的转型问题。以非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即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取代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是近代山东乃至近代中国现代化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特点，这是由中国国情和山东省省情所决定的。研究和认识现代化模式转型的历史必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性，对于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走向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研究努力吸收海内外的研究成果，并广征省内、国内及海外历史资料，特别是利用“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大量利用各级档案馆的历史档案，以客观地、真实地再现近代山东区域现代化的原貌。在方法上，我们力求史论结合、以史见论，不托空言，不泛泛议论。在论证上，我们更力求运用唯物史观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现代化理论通贯全书，使之更具理论性、科学性、正确性，达到不仅言之有据，而且言之成理。对一个省区的现代化问题进行系统的、全方位的研究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其挑战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试图构建区域现代化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以兹对区域现代化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化研究有所裨益。

现代化是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迟早都要走向现代化，所不同的是走向现代化的具体方式。美国社会学家 M·列维按照不同国家现代化历程的起步时间以及启动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前者以英、美、法等欧美国家为典型。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早在 16、17 世纪就开始起步，现代化的最初启动都源于各自社会的内部因素，是本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其自身历史的自然绵延。后者包括德、俄、日及当今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现代化大多到 19 世纪才开始起步，最初的诱发与刺激因素主要来源于外部世界对其生存的严峻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西里尔·布莱克有着与 M·列维大体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每个社会的传统内部都有发展成现代化的因素，只不过有的可以通过自身不断发展来实现，即内源型现代化模式，而有的则需要外部的刺激或压

力来完成,即外源型现代化模式,或传导型模式。由于外源型国家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兼容关系较差，自身内部推动现代化的因素较弱,因而需要采取强制手段,对现代化的前提进行补偿。补偿的方式可以是经济、社会、文化、技术或心理的,但最终则是通过政治的形式，即国家政策来实现。因而国家政权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作为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的历程是以 19 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为起点的。由于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的不和谐结合,由于这个古老民族背负的历史包袱过于沉重,由于对外部世界的挑战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当现代化问题由于外部世界的刺激历史地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中华民族似乎显得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被动和不知所措，也因此注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复杂和曲折。

山东作为中国东部沿海的一个省份，是最先接受外部世界挑战的地区之一，其现代化的启动与演进与中国整体现代化的启动与演进具有同步性。山东区域现代化的启动与演进无疑与中国整体现代化的启动与演进在许多方面具有共同性，但也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

山东区域现代化的进程同样经历了由浅入深，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演化过程，即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精神文化层面转变的过程。大致说来,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9 世纪 60 年代自强运动在山东的兴起前夕，是山东区域现代化的准备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没有直接进入山东,山东也没有对外开放通商口岸,但西方商品经过五个通商口岸进入中国后,通过运河和沿海两条途径已经开始向山东缓慢渗透。这种渗透所产生的影响尽管在

开始的时候还是微弱的,不易察觉的,但意义却是深远的。如果把自然经济比作江河的堤坝，外国商品的渗透就如同堤坝上的蚁穴，它将在不知不觉中最终使自然经济的堤坝发生崩塌。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对山东传统经济秩序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它‘温室般地助长’着古老中国的这个沿海省份‘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开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性转变。

但总的来说,在烟台开埠以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对山东的影响较小,外部世界对山东的冲击是间接的,迂回的。西方商品经济对山东的渗透并不明显，因而山东对外来冲击的反应也表现得较为麻木、迟缓,不够敏感。还无力洞悉这种外力冲击将对社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对外来冲击的认识还处于低层次的感性阶段,尚未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但是,无论如何,鸦片战争的发生,对于中国东部的这个沿海省份来说,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它标志着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已经不庸置疑地摆在了山东人民的面前,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客观上它已经存在了。

从 19 世纪 60 年代烟台开埠到 20 世纪初清末‘新政’实行前夕,开始了山东区域现代化向器物层面推进的过程,也是山东现代化的启动时期。烟台开埠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很快发展成为连接南北、辐射山东内地乃至东北、朝鲜的重要通商口岸。中外客商纷纷云集烟台,寻求发展机会。到光绪年间,烟台各类商号发展到 1000 余家。在这些商号中,除山东本地商人外,以广东、宁波、福州等地的商人影响较大。烟台与南方的广州、厦门、汕头、福州、宁波、上海的贸易日趋频繁,尤其是上海,一直是烟台进出口货物

最重要的贸易港口，洋货和上海本地生产的纺织品等轻工制品大量运往山东分销，上海也是烟台最大的土货转口输出港。烟台同北方各港口的贸易在开埠前就比较发达,天津、营口相继开埠通商后,烟台与这些港口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烟台开埠后,外国商人也把目光纷纷投向烟台。到 19 世纪 80 年代，在烟台设立的洋行及代理行已达 20 余家。外国商人把烟台作为向山东及内地省份推销商品的理想场所,将大批洋货直接运销烟台,同时外国商人也把山东的土特产经烟台销往国外，从而使烟台的国际贸易量急剧增长。

随着烟台的开埠，逐渐形成了以烟台为枢纽的连接省内各地的新型贸易商路,其中主要有烟台连接山东腹地的烟潍商路,连接鲁北和鲁西北的渤海沿岸水运商路和沟通胶东与鲁南的黄海沿岸水运商路。这些商路就像一条条大动脉，以其敏锐的触角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渗透到山东的穷乡僻壤，并延伸到中原和华北内地。继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之后是外国资本在山东开矿设厂。外国资本在山东的早期工业投资，基本上集中于船舶修理业和原料加工业。19 世纪 60 年代，外国进出烟台港的船只增加很快，每年都在 600 只以上。适应外商轮船沿海航运发展的需要，德商在烟台开办了李契曼船舶修理制造厂,该厂配置机械设备,承修来往烟台的外国船只。1872 年，美商在烟台成立了第一家蛋粉厂。1877 年,德商又在烟台成立了山东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到 19 世纪末在烟台设立的外国公司达到 26 家。烟台开埠后,外国轮船公司纷纷开辟至烟台的航线，并逐步控制了烟台及山东沿海的航运业。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山东进行直接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外部世界对山东也由间接冲击变为直接冲击。西方商品和资本的大量涌入，加

速了山东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

作为外来冲击的直接反应，就是自强运动在山东的兴起。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和与洋人争利，山东的洋务派官僚和民间资本纷纷投资办厂，在山东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山东机器局是洋务派官僚山东巡抚丁宝桢创办的山东第一家初步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山东机器局 1875 年开始兴建，1877 年正式投产，是自强运动中的一个较为成功的中等规模的军工企业。洋务派在山东创办民用企业开始于 19 世纪 80 年代初，在兴办方式上，采取了“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方式。其中较有成效的是电信业和采矿业。1881 年上海至天津间的电报线路架通，济宁成为沿路 7 个电报局之一。1882 年，济宁至烟台的电报线路铺通。1883 年，电报总局在德州开设电报局，翌年，胶州设立电报局，1887 年潍县设立电报局。至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兴办的电报线路已遍布全省各主要城市。电信业的发展对于山东区域现代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采矿业规模较大的有官办的淄川铅矿、淄川煤矿，官督商办的峄县中兴煤矿、平度金矿等。近代企业在山东的出现，开始了山东区域现代化向器物层面的推进，也是山东区域现代化真正启动的标志。

随着山东区域现代化在器物层面上的深化，必然要求向更高层次的制度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的推进。就全国来说，现代化由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的推进开始于 19 世纪末的戊戌变法。但是，戊戌变法实际上只是势单力薄的维新派依靠同样势单力薄的光绪皇帝的一种不成功的政治冒险。它除了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产生了一定影响外，全国大部分省份并未认真响应。戊戌维新是中国甲午战败直接刺激的结果。中日甲午战争

对山东的冲击是直接的，但山东对这种来自外部的刺激的反应总的来说是低层次的，主要是以仇教排教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低层次的情绪化反应不仅无助于危机的缓解，反而使危机进一步加深。巨野教案的发生，给德国占领胶州湾以借口，并最终引发了一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百日维新期间，山东奉命“维新”，但也只是在办理保甲，劝导乡民发展农政工艺等方面做做文章，并未涉及实质内容。

山东区域现代化由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的推进开始于清末“新政”。西太后扼杀了百日维新，但她却无法扭转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双重危机，终于使清王朝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镇压了戊戌变法的西太后不得不充当维新志士的遗嘱执行人，被迫推行“新政”，开始自上而下的改革。随着清政府“新政”措施的全面推行，山东区域现代化开始由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的推进。1901 年 1 月，清廷发布筹办“新政”的上谕，要求各大臣、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主、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己见，条议上闻”④。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对清政府的“新政”积极响应和拥护。1901 年 4 月 25 日，袁世凯上奏朝廷，向清廷提出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知、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等筹办“新政”的 10 条建议。

清政府发布“新政”上谕后，陆续颁布了整顿吏治，调整官制，改定刑律，废科举，兴学校，派遣留学，办理警务，编练新军，奖励实业等法令。总的来说，山东对清政府的“新政”法令的落实是积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期间即对筹办“新政”十分卖力,设立了银元局,开办了课吏馆、校士馆,创办了商务总局,还成立了山东大学堂。1901 年,袁世凯调任直隶总督后,清政府的“新政”措施在山东继续得到贯彻落实。根据清政府颁布的“新政”方针,山东地方政府陆续裁撤、合并了一些旧机构,设立了一些新机构。省内新设巡警道、劝业道、高等审判厅和高等检察厅,以及山东筹款局和商务局,改提刑按察使司改为提法使司,裁学政,改设提学使,直属学部。各州、县相应增设警务长、劝业员、典狱员、主计员、视学员等佐治官员,分掌各项事务。

然而,清末“新政”并没有完成中国现代化制度上的转型。当晚清政府的立宪骗局彻底暴露之后，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派更加坚定了另起炉灶的决心，也使资产阶级立宪派大失所望。既然晚清政府已经在事实上丧失了领导中国现代化的资格，那么它的继续存在也就失去了任何合法性的依据，这个不可救药的政府的最终被抛弃就自然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惟一选择。辛亥革命的发生正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辛亥革命的发生，改变了中国现代化原有的运动轨迹和运作方式，由原来的渐进式的改良一变而为急速的突进。革命打破了旧的社会平衡，各种社会力量在剧烈的动荡中进行新的整合。山东辛亥革命在烟台和济南等地区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尽管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是“奉旨革命”,是假独立,并昙花一现,但革命派的烟台革命政府却存在,并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现代化在制度层面上的推进,对于人们思想文化上的影响是直接的。随着清政府“新政”措施的推行,人们的社会心理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废除科举制度后,各类新式学校的兴办和留学生的大批派遣出国,逐渐在

山东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至辛亥革命前夕，山东公费、自费留学人员大约在 360 人左右，省内各类新式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则更多。1901 年 9 月 14 日,清政府颁布命令“: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为小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学艺为辅。务使学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事务，讲求实学。’[⑤]根据这一精神,山东巡抚袁世凯于 1901 年 11 月率先将原济南泺源书院改为山东大学堂，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所省立大学堂。在高等学堂建立前后,山东各级各类新式学校纷纷建立,据不完全统计,1900—1912 年，山东全省建立各类新式学校 1800 多所。新式教育的发展,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和教学方法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一个在思想观念、处世态度等方面与科举教育培养出来的旧知识分子截然对立的新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容易接受西方思想文化观念，是推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中坚力量。这些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对封建旧制度持批判态度。他们对山东新风气的树立,对山东区域现代化向文化层面的推进起到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随着辛亥革命后山东区域现代化在制度层面上由君主立宪政体向民主共和的转变，思想文化层面的改革也更加深入。特别是五四时期，随着各种西方新思潮的涌入，使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解放,各种新思潮提供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也使人们在对各种新思潮的比较中获得更充分的选择余地。五四时期的山东,新思潮的涌动虽不像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上海那样惊涛拍岸，但同样思潮滚滚，呼啸壮观。素有文化传统的齐鲁之邦，

历来是思想文化异常活跃的地区。进入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各种新派人物崇尚理性，议论时政，在追求信仰中对中华民族的出路问题进行着各种不同的探索。王朝俊、范明枢、王祝晨、王乐平、王尽美、邓恩铭等都是山东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随着新思潮的传播，新旧思想的斗争也空前激烈。1919 年 12 月 23 日《晨报》报道“：济南有了一件很可观的事，就是有了新旧之争，而第一师范就是争的场所，教员学生皆分为两派，持新主义的人数少而力量多。”其实，即使在持新思潮的群体中，也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新思潮的区分。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局面极大地深化了山东区域现代化思想文化层面的改革。

国民党山东地方政权建立后，山东区域现代化暂时被纳入了国民党的设计轨道。国民党统治时期以韩复榘主鲁时间最长，也最具代表性。韩复榘具有浓厚的封建思想，并顽固反共，残酷镇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但他也具有“近代”意识，主张“励精图治”，扬言要“变鲁变齐”，“为我山东开一新纪元”。因此，在他主鲁时期，现代化不仅在器物层面，而且在制度、思想文化层面都较前有所深化。韩复榘崇拜美、德、意、日，也推崇苏俄，认为这几国都是在短时期富强起来的国家，而中国现在却是“科学落后”，事事不如人，“在世界上落伍了”，因此中国应当向它们学习：“我们如不勇往直前，为人民去找出路，国家非亡不可，……人家进步，你不进步，便会被淘汰的”⑥。他主张发展民族资本，同时也赞同“限制资本”，认为像美国那样的垄断经济状况也不好：“资本愈发达，贫富差距愈大，结果苦乐不均，社会的痛苦就一天比一天加深了”⑦。九一八事变后，在“振兴实业”、“提倡国货”浪潮的推动下，他积极提倡国货。在 1934 年济南国货商场开业典礼上，他说“：如今世界

潮流,科学进步,工商业竞争。我国事事落后,因为工商业不如人,每年才有几万万的入超。流出去的是哪里来的?都是中国人的,……以后无论个人、家庭或是所在的机关,凡本国有的东西,不管是好点坏点,钱贵点贱点,还是用本国的好。因为少买一点外货,钱少流出一点,国家就多一点生机。望大家觉悟、猛醒,努力实行。'⑧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采取多种措施发展社会经济,山东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如济南在 1935 年前新增民族工厂十几家。金融业在'五三惨案'后只剩两家的情况下,增至 23 家。其他矿业、手工业、商业等,均出现繁荣的景象。工业化的发展程度创山东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政治方面,他力图'澄清吏治',严惩贪污受贿,制定了严厉的官规和各种工作制度,形成山东政治的一大特色。文化教育方面,韩复榘一方面统制舆论,另一方面也注重文化教育的发展,文教经费逐年增长,教育和各种文化设施的建设达到空前规模。1935 年华北事变后,随着新的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韩复榘逐渐放松了对思想文化方面的统制,为进步文化在山东的发展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也为抗战时期山东新的文化高潮的到来创造了客观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形成了国民党、共产党、日伪政权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相互斗争的复杂局面。也正是在这一特殊而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孕育着山东区域现代化最终的选择方向。日伪政权的殖民统治理所当然地受到山东人民的唾弃。国民党政权则由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影响逐渐弱小,从而失去了对山东政局的驾驭能力。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其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并逐步掌握了山东区域现代化发展的设计权,为山东区域现代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解放战争时期,经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

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的激烈大搏斗，中国共产党设计的非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最终取得了胜利。

在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上，山东既遵循中国整体现代化的一些共同规律，又有自己的特点。大体上经历了从旧王朝体制下的探索资本主义发展趋向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到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政体的创立时期，到抗日战争爆发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与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的激烈竞争时期，再到解放战争开始后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的最终取胜时期。

从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即从自强运动经过维新运动到立宪运动,大约半个世纪,这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初始阶段,是在旧王朝体制下探索资本主义发展取向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清王朝在经过长期的痛苦的抉择之后，最终选择了二元君主立宪制的政治现代化改革方案。在这一体制下，君主的权力受到宪法和议会的一定限制,但君主有解散议会、否定议会决议以及不经过议会颁布非常命令的权力，宪法由君主钦定。这一模式为一些具有革新思想的旧官僚所接受。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和曾任驻外公使后任山东巡抚的孙宝琦是二元君主立宪制政体的积极拥护者。与清王朝推行二元君主立宪政体的方案不同，立宪派主张实行英国式议会制君主立宪政体。名义上军民共主，但君主为客体，人民为主体。君主仅拥有虚位，不对国事负责，其权力如任命官吏、签署法律等只是象征性的。立宪派的立宪既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一种现代化变革，同时又是对清王朝的一种挽救。对于两种不同的立宪模式在山东都不乏拥护者，但是各自的出发点却是不同的。旧官僚对二元君主立宪政体的拥护是因为这种政体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立宪派对君主立宪的拥护则因

为君主立宪政体不仅能够提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而且还可以实现平稳的有秩序的政治过渡，避免社会的剧烈动荡。由于君主立宪政体与未曾受到资产阶级文化启蒙，仍然生活在自给自足生产方式下的广大下层平民百姓的深厚儒家传统观念也正相契合，因此它也受到广大社会下层群体的广泛认同。

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前是山东区域现代化民主共和政体的创立时期。这期间又可分为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两个不同的阶段。北洋政府时期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两千多年来‘家天下’的世袭王朝体系的土崩瓦解,客观上为中国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难得的契机。特别是议会政治的确立对山东民主政治的建立具有深远意义。尽管它从一开始就被军阀政客所操纵,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政治作用,但是,从军阀政客处心积虑地想操纵议会本身来看，就已经说明了议会在现代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说明军阀政客还不愿意用一副专制的面孔与人民相面对(一般是这样),他们需要粉饰自己,伪装自己,需要一件民主的外衣。但由于王朝倾覆后的权威危机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北洋军阀时期以民主共和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并不成功。以“革命”为旗号的国民党取代了北洋军阀，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某种契机,也给人们以某种憧憬和期盼。但是,现代化的演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民党政权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党政军三位一体，权力高度集中。这种以国民党的名义重新建立的中央集权是对袁世凯死后，中央对地方陷入失控局面的一种矫正,反映了国家从混乱走向统一的客观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任何集权归根结底都必然走向个人独裁,从这个意义上讲，集权政治必然以牺牲政治民主为代价。国民党统一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